

晓亮与混合所有制

■白卫星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年以来,混合所有制已经从理论推向实践纵深。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这是我国改革发展实践和认识成果的进一步深化。

关于混合所有制,这并不是新概念。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随着产权的流动和重组,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越来越多,将会形成新的财产所有结构。”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优势企业,宜于实行股份制,要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和企业相互参股等形式,改为股份制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应该说,“混合所有制”从理论到实践,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

那么,“混合所有制”是何时提出的,是谁提出的?据我所知,混合所有制概念是晓亮先生最早提出并加以深入阐述研究的。

晓亮也说:“我大概是最早提出‘混合所有制’概念的学者”(见《晓亮草根经济文选》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5页)。他还说:“混合所有制是于光远和我提出的一个概念。”他在进一步解释这个问题时补充道:“于光远说,化学元素都是纯而又纯的,而自然界的物质绝大多数是化合物,即使是99.99%,也不是纯的。基本的所有制可以组合成各种各样的混合所有制。但他没有写文章。我是在90年代初开始写文章论述混合所有制概念及其优越性的。”(见《经济学家》2004年第2期、《中国流通经济》2004年第10期)

我曾经三次直接听晓亮先生谈论混合所有制问题。第一次是1990年7月在武汉市举行的“第三届全军军事经济理论研讨会”上。会议主办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研究中心邀请晓亮先生作学术报告。会间,我向晓亮先生请教有关问题,他就提到过“混合所有制很有发展前景”的观点。第二次是1993年8月在银川市举办的“市场经济与西部经济发展学术联谊会”。当时,我作为会议主办方——《市场经济研究》杂志的副主编,邀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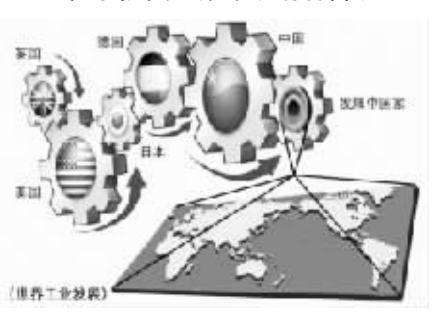
中美两国宣布达成了一项意义重大的协议,同意大幅削减全球各地电子产品的关税,给两国长期的贸易谈判画上了成功的句号,两国能否达成贸易协议已经成为对全球两大经济体能力的重大考验。

11月11日在北京宣布的协议,结束了一场将近18个月的僵持。这场僵持曾导致50多个国家旨在修订1996年《信息技术协议》的谈判被冻结。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北京表示,美中两国已在扩大ITA协议问题上达成“谅解”,此举“将有利于在日内瓦举行的更广

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能走多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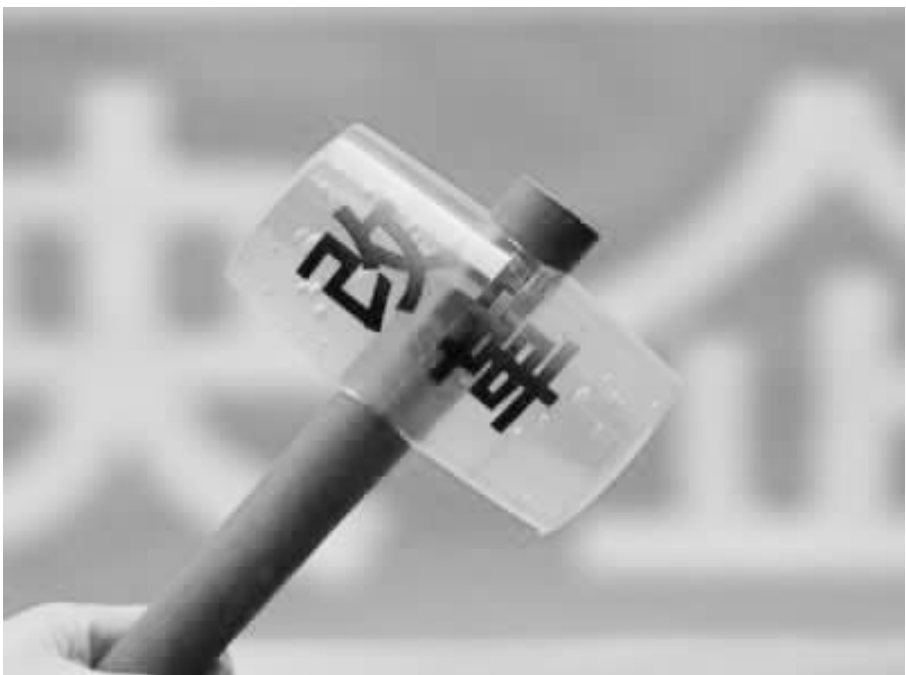
那么,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能否复制上述成功?梦想美好,现实残酷。这个看似一石二鸟的设想中,“阿喀琉斯之踵”在于投资回报率没有保障。



■徐瑾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到来之际,北京给予最高礼遇,放假限行并用,久违的北京蓝天甚至被网络戏称为“APEC蓝”;与此同时,中国社交媒体以及资本市场则因为“中国马歇尔计划”而躁动不安,甚至有国内券商报告乐观表示这一计划直接涉及上千亿美元对外投资,间接效应更是不可限量。

不知是幡动心动抑或心动,这一计划目前并无官方说明,出台时间难言靠谱,不过提前讨论也有必要,那么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可行性以及持久性如何?所谓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理论界其实已经提出过不止一次,无论是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还是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都曾提出



戴园晨、何伟、晓亮、陈栋生等经济学家参加。会上,晓亮先生作了学术报告,他说:“几天前我写了一篇文章,混合所有制看来很有发展前景。”此报告后来以《市场经济与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为题发表于1993年第3期的《市场经济研究》杂志上。第三次是2005年4月参加第七届中国(晋江)国际鞋业博览会期间,我陪同晓亮先生在考察晋江企业时,他对混合所有制问题谈得非常系统,非常深入。

“混合所有制”究竟是怎么提出的呢?这就需要晓亮先生就所有制理论研究的脉络进行考察。

我们知道,晓亮先生早于1988年就出版了《中国所有制结构研究》一书,对所有制问题的研究有许多新认识。但他对混合所有制的研究应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晓亮先生在1982年第2期的《经济问题探索》发表的《对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探索》和同年第6期《中国经济问题》发表的《我国现阶段的国家资本主义》两篇文章,应视作晓亮先生对我国所有制问题的初步认识。他在1985年第5期《江海学刊》发表《试析“社会主义集团所有制”》一文,他在文章中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各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也都事实上进行着调整和变革。特别是随着生产经营责任制的推行,企业之间联合和合作经营的出现,入股集资等办法的实行,而这些又往往是在不同所有制形式之间发生,这样就使得各种所有制之间的界限

财经新闻

中美信息技术贸易谈判取得突破

范围谈判快速完成”。

该协议还需要得到ITA谈判的其他参与国的签字,此前ITA谈判一直在世贸组织(WTA)框架内进行。预计该协议在未来几周内将获得批准,不过,美中协议范围不包括平板电视。这可能引起日本、韩国等平板电视生产大国的更大不满。一旦执行之后,

新版ITA将大幅降低关税,使得逾250个种类的高科技产品——从无线耳麦到新型半导体和医疗设备——能够自由贸易。

今年,中国方面大幅缩短了例外产品清单的长度,减少到几十种。最近几周与美国的谈判集中于不到10个产品类别,包括下一代半导体、加工中使用的先进测量工具,

类似设想。林毅夫为FT中文网撰稿《呼吁全球结构转型基金》一文中表示投资于能够提高生产力的基础设施项目,对创造国内外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至关重要,对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转型发挥重要作用。

按照许善达的设想,中国可以用5000亿美元的规模建立“和谐世界计划”基金,其中含1000亿美元或其他外汇规模及三万亿人民币。该基金向发展中国家(其政府)提供低息贷款用于借款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而项目建设和采购要在中国企业中进行。

目前支持派基本思路差不多,认为“马歇尔计划”在“二战”以后不仅促使欧洲复兴,也让美国从中大受受益。从经济角度考虑,中国面临的形势与“二战”后美国相似,即产能大量过剩、国际储备充沛。如果顺利实施,该计划可以达到消化国内过剩产能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两大目的。

历史是否总敲两次门?回顾过去,美国马歇尔计划有其特定背景。二十世纪初期,欧洲尤其是西欧仍旧在世界经济之巅,美国只是国际市场的新兴玩家,随着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经济陷入困境,城市饱受战火摧毁,民众濒于贫困,此时美国国际地位则显著提升,因此以官方名义制定了欧洲复兴计划,并且当时国务卿马歇尔名义命名为“马歇尔计划”。这一计划1947年启动,持续了四财年,西欧各国接受援助合计130亿美元,占当时美国年度GDP1/20。以今天价格比较,这笔援助可谓巨款,这一计划不仅使得西欧经济重新崛起,而且促进了西欧各国一体化,从政治角度而

‘模糊’了,不加强格地进行分析就会难以把握。各种所有制之间的融合的趋势,是当前所有制关系变动的一个新特点。”他在1986年第1期《中州学刊》发表的《对城镇集体所有制问题的几点看法》中说:“正因为经济形式多样化了,所以也就使得一些所有制之间的界限不清了。特别是全民、集体和个体经济的联合体,其所有制关系就不像以往那样单纯了。”这两段话是晓亮先生洞悉所有制关系的变化而作出的科学分析,也是他对“所有制之间融合”向“混合所有制”过渡的思想表述,是“混合所有制”概念的雏形。

因此,他在1986年第3期《江海学刊》发表的《论所有制结构》说:“这类企业就不是完全的全民所有制,也不是完全的集体所有制。那么,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会不会产生新的所有制关系?会不会使几种所有制形式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以致消失呢?”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大胆探索,晓亮先生在1989年第4期的《学术百家》发表的《股份制与国家所有制的改革》一文就首次正式提出混合所有制概念。他在该文中说:“即使是试验股份制,也可以结合实际,搞多形式、多样化。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混合所有制。通过联合,通过股份制,全民所有制企业很可能有不少会变为混合所有制。股份制不是一个所有制概念,它可以容纳多种所有制。但混合所有制是一个所有制概念。它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基本所有制

结合而形成的,并且有可能吸取多种所有制的优点,所以值得重视。”这是晓亮先生第一次正式提出混合所有制概念,也是目前我查到的最早的关于混合所有制说法的出处。从概念的雏形到正式提出混合所有制,跨越了近十年。

此后,晓亮先生在1991年第6期的《经济科学》发表的《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所有制结构》、1992年第5期《天津社会科学》发表的《公有制基础上的多形式、多样化是中国经济一大特色》等文章都有关于混合所有制的思想。

晓亮先生在《经济学家》2004年第2期发表的《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兼论“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我认为是晓亮先生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系统论述。关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性质和优越性,晓亮先生认为,从总体来说可以称之为社会所有制,因为企业的资产,由不同的投资者的投资而形成,这些资产已经融合在一起了,已经社会化地占有和使用了。特别是在股份制企业中,资本的所有权已经分离为股权和法人所有权了。资本的所有者变成了投资者,已经不能再取出来归自己支配了,但他可以分红得利,只负有限责任,有权参与企业的决策。他认为,混合所有制比起单一的所有制,其优越性是很多很多的,所以它的发展前景相当广阔,不可估量。关于混合所有制与混合经济的问题,晓亮先生认为,混合所有制指的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指的是企业。关于混合经济,原本是指一个社会的所有制结构,宏观经济成分,是由多种所有制组成,也就是马克思说的经济结构概念。他们之间有主有次,又互有联系,协作配合,也可以转化。但每一种所有制之间的界限还是清清楚楚的,这就是混合经济。只有社会上的所有制全部由单一的所有制组成,才不是混合经济。我国现阶段的宏观经济结构,就是混合经济。其中有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外资经济等,甚至还有股份制、联营经济,还有社团所有制、社区所有制、基金所有制,种类繁多多样,形式也不尽相同。但它们之间的界限还是很清楚的,坚持“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

晓亮先生在研究所有制问题上,一贯注重改革实践的调查,善于观察发展中的新问题,他的许多见解和观念既来源于实践又超前于实践。正是晓亮先生站在时代的前沿,通幽洞微,仰观俯察,才率先提出混合所有制理论,对指导我国所有制改革,推动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以及用于下载电子游戏等软件的POS机点卡。

就在近日,美国官员对中国表示了失望。但过去几天里,谈判在北京重启,到11月10日双方就在交换一项协议的最终文本和翻译版了。

(FT中文网)

具备正的投资预期回报的项目。但这类项目大多数已经被市场机制所发掘,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优势是在资金成本上的优势,如此,那些投资回报率高于马歇尔计划利率、而低于市场利率的项目有可能成为马歇尔计划的受益者。第二种解决方案是中国模式。在中国,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就其投资回报率而言,很多都低于资金成本,但其社会回报率高于资金成本,而这种社会回报最终以税收增加、尤其是土地增的方式反流给当地政府,这样形成一个正反馈循环。

依赖投资基础建设的中国模式能否复制全球?不可忽视的一点在于,无论如何看待中国模式,中国过去道路揭示了两个关键点:首先,政府拥有庞大政府资产,尤其是土地,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社会效益有很大比例转化为政府收益。其次,中国政府是有效管理的政府,即使有所漏出(如各种腐败),总体而言,社会效益的主体被政府获得。反观很多发展中国家,其实并不具备以上两个条件。结合各国政治运行方面的弊端,项目获得成功并具备充分的政治意愿保证归还中国资金,成为很难保证的事件。

再来看另一段历史提供的启迪。一方面是国内过剩产能缠身,资本投资回报率节节下滑,另一方面是外汇储备一路攀升,本币面临升值压力——听起来有点耳熟,不过这不是说中国,80年代的日本也曾经面临类似困境。选择有两个,一个资本主义的设想,让该破产的企业破产;另一个则比较温和渐进,那就是投资海外。当时的日本并没有选择出清

结合而形成的,并且有可能吸取多种所有制的优点,所以值得重视。”这是晓亮先生第一次正式提出混合所有制概念,也是目前我查到的最早的关于混合所有制说法的出处。从概念的雏形到正式提出混合所有制,跨越了近十年。

此后,晓亮先生在1991年第6期的《经济科学》发表的《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所有制结构》、1992年第5期《天津社会科学》发表的《公有制基础上的多形式、多样化是中国经济一大特色》等文章都有关于混合所有制的思想。

晓亮先生在《经济学家》2004年第2期发表的《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兼论“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我认为是晓亮先生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系统论述。关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性质和优越性,晓亮先生认为,从总体来说可以称之为社会所有制,因为企业的资产,由不同的投资者的投资而形成,这些资产已经融合在一起了,已经社会化地占有和使用了。特别是在股份制企业中,资本的所有权已经分离为股权和法人所有权了。资本的所有者变成了投资者,已经不能再取出来归自己支配了,但他可以分红得利,只负有限责任,有权参与企业的决策。他认为,混合所有制比起单一的所有制,其优越性是很多很多的,所以它的发展前景相当广阔,不可估量。关于混合所有制与混合经济的问题,晓亮先生认为,混合所有制指的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指的是企业。关于混合经济,原本是指一个社会的所有制结构,宏观经济成分,是由多种所有制组成,也就是马克思说的经济结构概念。他们之间有主有次,又互有联系,协作配合,也可以转化。但每一种所有制之间的界限还是清清楚楚的,这就是混合经济。只有社会上的所有制全部由单一的所有制组成,才不是混合经济。我国现阶段的宏观经济结构,就是混合经济。其中有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外资经济等,甚至还有股份制、联营经济,还有社团所有制、社区所有制、基金所有制,种类繁多多样,形式也不尽相同。但它们之间的界限还是很清楚的,坚持“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

晓亮先生在研究所有制问题上,一贯注重改革实践的调查,善于观察发展中的新问题,他的许多见解和观念既来源于实践又超前于实践。正是晓亮先生站在时代的前沿,通幽洞微,仰观俯察,才率先提出混合所有制理论,对指导我国所有制改革,推动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据美国官员介绍,全球IT产品贸易价值约为每年4万亿美元,而新版ITA在生效后 will 将影响其中1万亿美元贸易。美中11日达成的协议仍须得到参与ITA谈判的另外50多个国家的批准,但这个过程预计在几周内即可完成。

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奥巴马政府此前展开协调一致的努力,试图让中方相信达成协议将能带来的那些效益。从总统开始,美方各级官员近几个月来都在推介ITA的好处。弗罗曼指出,ITA是对中国及其在其他双边和“诸边”谈判中所扮演角色的一个考验,这些谈判已成为美国贸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弗罗曼称,下一个考验将是中国明年初提交的中美投资协定负面清单(中国将在清单中列出它想排除在协定之外的那些行业),此项协定的谈判将于明年启动。他表示,那将是一个“重要指标”,将展现出中国准备在多大程度上拥抱经济改革和开放国内市场,尤其是服务业市场。

贸易官员们指出,中国仍是棘手的谈判对手,它往往要依赖APEC这样的“非拿出行动不可的重要场合”来克服内部的分歧和勾心斗角。

(FT中文网)

对于崛起中的中国,借助经济的外交将成为未来战略的重要一步,无论此前的金砖银行还是亚洲投资银行都彰显中国的宏大雄心。中国资本对外扩张有经济上的天然动力,中国目前已经向资本净输出国靠拢,官方数据局表示今年前9个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750亿美元,同比增长21.6%,与此同时,中国对于外商投资则面临压力,今年前9个月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874亿美元,下降1.4%。从这个角度讲,中国资本的对外扩张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如何做的问题。

对比历史与现实,中国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教训?首先,投资于发展中国家机会多,但陷阱更多,或许在投资目的国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举是一个方向。其次,国家主导的外援效果明显,但也有看不见的成本,中国应该考虑主要依赖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作为行动主体,政府可以起到积极引导、因势利导、协调组织的作用,而不宜越俎代庖,以政治考量代替经济核算。第三,资本的海外扩张主要经济目标是优化资源配置,而不应该对其消除过剩产能的作用寄望过高。过剩产能的调整离不开痛苦的结构改革,与资本海外扩张的经济逻辑关联不大,不应对此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热视角

中美经贸并非只有“对攻战”

中国和美国日前达成一项协议,为全球削减针对高科技产品的关税铺平了道路,同时它可能标志着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

由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北京宣布的这项协议,打破了世界贸易组织(WTO)1996年《信息技术产品协议》(ITA)修订问题谈判持续近18个月的僵局。谈判目的是将视频游戏机和下一代半导体等产品纳入该协议的覆盖范围。不过,这一进展也许会对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如何在更大的论坛上合作产生更大的影响。

“这不仅对中美贸易关系是令人鼓舞的消息,”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弗罗曼表示,“它还表明,美国和中国可以开展合作,既推进我们的双边经济议程,也支持多边贸易体系。”

由21个国家参加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论坛会议11月11日在北京闭幕。此次会议上,人们的关注焦点在很大程度上落在美国和中国的战略竞争上,以及落在已被有些人称为“太平洋贸易协定对决”的角力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APEC国家领导人批准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路线图是迈出了“历史性一步”。与此同时,奥巴马和他的谈判代表近日投入大量精力,以求与日本和另外10个经济体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该协定将中国排除在外)谈判上取得进展。然而,有关IT产品的协议展示了中美关系的另一面。两国即便是在战略上相互包抄对方的时候,也热衷于设法合作,达成有望产生更快商业影响的协议。

据美国官员介绍,全球IT产品贸易价值约为每年4万亿美元,而新版ITA在生效后 will 将影响其中1万亿美元贸易。美中11日达成的协议仍须得到参与ITA谈判的另外50多个国家的批准,但这个过程预计在几周内即可完成。

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奥巴马政府此前展开协调一致的努力,试图让中方相信达成协议将能带来的那些效益。从总统开始,美方各级官员近几个月来都在推介ITA的好处。弗罗曼指出,ITA是对中国及其在其他双边和“诸边”谈判中所扮演角色的一个考验,这些谈判已成为美国贸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弗罗曼称,下一个考验将是中国明年初提交的中美投资协定负面清单(中国将在清单中列出它想排除在协定之外的那些行业),此项协定的谈判将于明年启动。他表示,那将是一个“重要指标”,将展现出中国准备在多大程度上拥抱经济改革和开放国内市场,尤其是服务业市场。

贸易官员们指出,中国仍是棘手的谈判对手,它往往要依赖APEC这样的“非拿出行动不可的重要场合”来克服内部的分歧和勾心斗角。

(FT中文网)

对于崛起中的中国,借助经济的外交将成为未来战略的重要一步,无论此前的金砖银行还是亚洲投资银行都彰显中国的宏大雄心。中国资本对外扩张有经济上的天然动力,中国目前已经向资本净输出国靠拢,官方数据局表示今年前9个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750亿美元,同比增长21.6%,与此同时,中国对于外商投资则面临压力,今年前9个月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874亿美元,下降1.4%。从这个角度讲,中国资本的对外扩张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如何做的问题。

对比历史与现实,中国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教训?首先,投资于发展中国家机会多,但陷阱更多,或许在投资目的国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举是一个方向。其次,国家主导的外援效果明显,但也有看不见的成本,中国应该考虑主要依赖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作为行动主体,政府可以起到积极引导、因势利导、协调组织的作用,而不宜越俎代庖,以政治考量代替经济核算。第三,资本的海外扩张主要经济目标是优化资源配置,而不应该对其消除过剩产能的作用寄望过高。过剩产能的调整离不开痛苦的结构改革,与资本海外扩张的经济逻辑关联不大,不应对此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